

经济学家

茶座

主编 金明善 执行主编 詹小洪

2006 ·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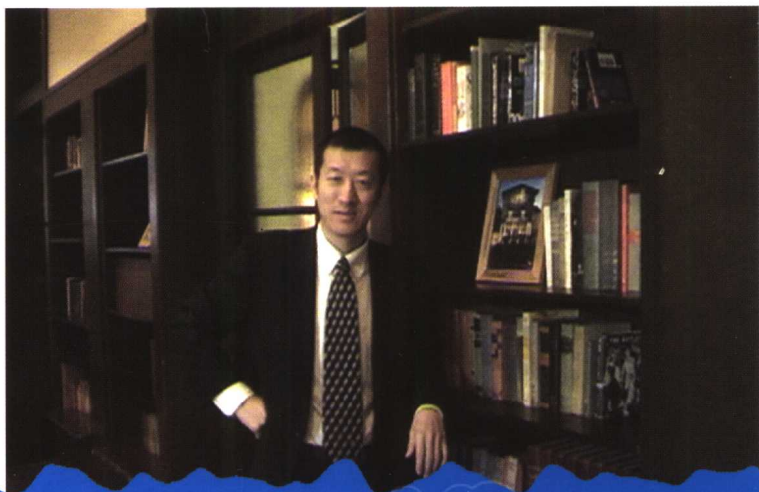
Teahouse For Economists

总第二十三辑

- ◆ 朱恒鹏 多收了三五斗：如何让农民富起来
- ◆ 罗肇鸿 中国人没有理由沾沾自喜
- ◆ 赵 泉 谷粒与粗粮
- ◆ 本 力 经济学家的「农转非」
- ◆ 王永钦 共享学术的喜悦与激情
- ◆ 梁小民 我与现代经济学
- ◆ 曹利群 一个小山村的产权故事
- ◆ 葛辉华 再论「三个和尚没水喝」
- ◆ 熊秉元 是非张五常
- ◆ 林跃勤 中俄人员与劳务合作：「黄祸」论挡道
- ◆ 张宇燕 印度之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荆林波博士，出生于“文革”爆发之际，大学之前在老陈醋的故乡生活。之后，在厦门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先后获得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曾经在山西财经学院任教，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所长助理，兼任服务经济与餐饮产业中心主任，信息服务与电子商务研究室主任。社会职务：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市场学会流通专家委员会秘书长等等。此外，曾经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洋插队”一年。著有《信息服务与经营模式》、《市场营销》、《消费者心理学理论与实践》、《中国商品期货交割》、《中国企业大并购》等多部著作，发表论文若干。

感谢家庭的熏陶和前辈的指点，我有幸步入经济学这个神秘的殿堂，徜徉于这无尽的海洋之中。经历了从学子到导师的换位，经受着实践的磨砺，在寂静与喧闹之中，体会着知识储备的升值与边际收入的递增。同时，对未知领域也越来越如饥似渴。当一个人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与偏好，选择自己喜爱的职业，他无疑是最幸福的人。因此，我庆幸自己没有入错行，能够透过窗外霓虹灯，独自倾诉“茶座情话”。

——荆林波

黎青漫画欣赏



异化



有恃无恐



创造第三次思想繁荣

王松奇

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上，曾出现过两次大的思想繁荣，即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时代和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后西方科学、民主思想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白话文运动兴起的时期。研究这两次思想繁荣的发生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规律的现象，那就是：它们恰好发生在中国社会制度发生根本转变的时期。春秋战国之交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演进的转型时期；而五四运动的前期政治准备则是 1911 年辛亥革命彻底终结了封建帝制，使中国处于一次新的历史转型的十字路口上。社会制度转型迫使人们去思考，而转型期宽松的政治环境也为人们写什么说什么提供了巨大的意识形态空间。

目前中国又处于一次新的制度转型期，这次制度转型不应当仅仅被看做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因为中国在既定的开放战略下已做好了融入全球化、适应地球村游戏规则的思想准备，这样，中国本次面临的制度转型肯定会包含文化价值观进步、社会政治文明进一步提升等多方面的内容。

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可以用有形的标准来衡量，而文化价值观的进步在短期内则很难形成无冲突的评价标准，常常要经历几十年、上百年的思想争鸣才能出现具有创新意义的先进文化价值准则。显然，在这样的思想争鸣中，会出现复古、复旧、复左、照抄照搬等种种错误倾向，但我相信：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思想繁荣肯定会成为一种可期待的现实，中国的经济学家也注定会成为第三次思想繁荣的一支积极推动力量。



经济学家茶座

(第 23 辑)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东京

王振中 王瑞璞

冯兰瑞 刘 伟

刘方棫 刘国光

吴树青 汪丁丁

张卫国 杨瑞龙

林 岗 项启源

钟朋荣 洪远朋

洪银兴 胡培兆

赵 晓 顾海良

梁小民 程恩富

蔡继明

主 编

金明善

副主编

刘德久

执行主编

詹小洪

责任编辑

董新兴

陈丹丹

【卷首语】

王松奇 创造第三次思想繁荣/001

【国是我见】

朱恒鹏 多收了三五斗:如何让农民富起来/004

罗肇鸿 中国人没有理由沾沾自喜/011

王东京 政府改革的经济学逻辑/016

周为民 从凌濛初的“经济思想”谈到政府帮助穷人的政治经济学/020

陈 钊 拍卖是国企 MBO 资产流失症的灵丹妙药吗? /024

李志宁 “低工资制”应当引起严重关切/026

【学界万象】

赵 泉 谷粒与粗粮/030

本 力 经济学家的“农转非”/036

王永钦 共享学术的喜悦与激情/041

荣敬本 话说中国经济学界的和谐/044

封 进 女经济学者的天空/048

【学问聊斋】

梁小民 我与现代经济学/051

王则柯 经济学常识与“人文关怀”迷雾/057

陆 铭 当中国经济学的苹果坠落/060

【经济评论】

晏宗新 “十一五”规划感言/062

俞炜华 富人的经济学/067

顾海兵 中国大学成本计算存在严重低估/070

管清友 石油的经济租金/075

董志强 经济行为的公平原则/079

马同斌 民营企业创业者分裂的水浒模式/083

【经济随笔】

蒲勇健 “杂皮”为何当“领导”/088

赵刚 爆竹声中的启示/092

原磊 让“经济人”道德起来/097

曹利群 一个小山村的产权故事/100

李文溥 公园断想/104

郭艳茹 湘西的流窜匪帮/109

【生活中的经济学】

聂辉华 再论“三个和尚没水喝”/112

史晋川 “殴打致伤”与“咖啡烫伤”/118

邹方斌 免费报纸为何要派人看管/121

李华芳

汪亚军 短信经济与社会救助/123

【经济学人】

熊秉元 是非张五常/126

汤铎铎 叔本华的豪猪和哈耶克的知识/129

【他山之石】

林跃勤 中俄人员与劳务合作：“黄祸”论挡道/134

张宇燕 印度之行/140

詹小洪 “中国制造”在韩国/144

朱铁臻 在汉堡的日子/146

田南雁 说说美国大片/149

【来信选登】

有穷人的经济学吗？/153

放飞思想的舞台/155

经济学给了我什么？/15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家茶座. 第23辑

金明善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4

ISBN 7-209-03986-4

I. 经… II. 金… III. 经济学—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第038499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编辑部电话:(0531)82098901

E-mail: chazuo4901@sohu.com

发行部电话:(0531)82098027

82098028 82098029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2006年4月第1版

2006年4月第1次印刷

730×970毫米 1/16开

10印张 160千字

邮发代号 24-180

定价:14.00元



多收了三五斗：如何让农民富起来

朱恒鹏*

朋友聊天，说起他老家的地方政府计划要通过大力发展特色养猪业来使农民走向共同富裕，据称计划养猪上百万头，听说还要搞“公司+农户”模式。朋友问我有什么看法。对于农业上的这些“百万”计划，我一直心存疑虑。让农民共同富裕的动机无疑值得称道，为此制订发展规划亦在情理之中。问题是必须要了解农业的特征。要知道，好心办坏事的事情并不罕见。在判断这些“百万”规划可否让农民美梦成真之前，我和朋友聊起了农业的特征。

增产能不能增收？

“农业有哪些基本特征？”

“一个相当普通但是许多人并未作为决策前提的基本事实是：人们的食品消费存在着一个明确上限，一个人每天大致只能消耗不超过三千卡的热量。说白了，我们每月能够消费的粮、油、肉、蛋、水果不会超过一个很确定的数量，这意味着农产品需求从而农产品销售存在着一个难以突破的上限。按照经济学的术语就是，农产品需求既缺乏价格弹性，也缺乏收入弹性。缺乏价格弹性是说涨价需求基本不下降，降价需求也基本不增加。缺乏收入弹性是指农产品需求不能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而增长。家庭年收入从三万元增长到十万元，从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看，无疑是个飞跃，家电、轿车、旅行等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会有显著的增长，但是食品需求基本不会变化。换句话说，和二、三产业不同，农业规模不能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而增长，不能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这些特征意味着农产品的增产一般都会导致农产品价格下降。道理很简单：供给增加了，需求却不会增加，价格只能下降。所谓的‘增产不增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农产品需求存在上限和农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这两个特征结合在一起，使得农业‘增产不增收’这个特征表现得特别明显。”

“完全竞争市场？什么意思？”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我们不必拘泥于教科书中的严格定义，以农产品市场为例可以大致理解完全竞争市场的基本特征。农产品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这个市场上有大量的供给者，许许多多的农户销售粮食、蔬菜或水果，每个农户所占的市场份额微不足道，每个农户都没有左右价格的能力，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市场定价。”

“那市场价格又是如何形成的？”

“市场上许许多多的买者和卖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就以西瓜为例来说明吧。假设西瓜的单位生产成本是一元。无疑，作为卖方的瓜农肯定希望卖价越高越好，可是西瓜的需求是基本固定的。比如说你吧，今天就需要十斤西瓜，瓜农张三企图以十元一斤的价格卖给你。可是他刚刚喊出口，旁边的李四立刻告诉你八元他就卖，话音未落，瓜农赵五说两元他就卖。张三一听，直接说一元两角他就卖了，在此价格下，你们成交。刨掉一元成本，多卖的两角钱也就算张三的一点辛苦费了。按这个价格，张三一亩西瓜也就净赚两千元。这个收入就是瓜农们的净收益了。我们不必死抠概念，下面统一称该收益为农业的平均利润。”

“我明白了，农民们竞争的结果使得农产品的价格只能是生产成本加上一个平均利润，没有多少钱可赚，也就是点辛苦钱。他们不能不竞争吗？哦，我知道了，农民千千万万，不可能组织起来联合定价，组织成本太高了。”

“是啊，连几家最多几十家的彩电价格联盟、汽车价格联盟都难以维持，何况千千万万农户组成的农产品市场。实际上，如果农产品产量增加较大，明显超过总需求，别说平均利润，售价可能连成本都不能弥补。设想一下，如果就你一个买西瓜的，就需要十斤，可张三、李四、赵五各有十斤需要卖，最后竞争的结果可能是张三以五毛一斤的价格卖给了你，尽管亏了五元钱，可比一斤也卖不出去亏十元钱还是好一些。”

“中学时学过叶圣陶先生的《多收了三五斗》，和你描述的情形很相似。”

“《多收了三五斗》中农民‘增产不增收’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农业的这些特征，与体制没有多大关系，与‘洋米’和‘洋面’进口到中国也没有必然联系。”

“每天在菜市场上买菜的家庭主妇大都知道，很少有菜农试图以明显超过成本的价格卖菜，菜价基本是围绕着成本加一个平均利润小幅度波动的。实际上，分散的农户很少有人试图通过联合定价来改善自己的市场地位。”

“就没有办法联合定价了吗？政府不可以做这个工作吗？政府统一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农产品，然后以较高的价格卖给市民。”

“取消农产品市场，搞‘统购统销’？效果非常糟，这个早就试过了。”



“没有其他有效的办法吗？”

“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农民如果能够组织成一些农产品收购和销售合作社，可以产生一些有效的结果。听说英国的农户合作社和我们台湾地区的农会相当成功。他们对农产品价格有一定的影响能力。这样的农民合作组织还显著提高了农民的政治地位，据说在台湾，不管统派还是独派都要看农民的脸色。

“也就是说，农产品需求存在上限，加上农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这些特征，使得那些增加农业产量的办法，比如说技术进步或新的生产方式，都只能起到增产的作用，但不能提高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换句话说，这些方法并不能使农民走向共同富裕。”

“可它们可以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

“是的，技术进步可以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或者土地的生产率，但是如果农业从业人员不减少或者农用土地面积不减少，这种生产效率的提高会带来农产品总产量的增加，但却不能带来农民收入的增加。

“在总需求存在明确上限的情况下，超过总需求的产量增加没有意义，控制总产量使之和总需求平衡，那么技术进步等方法带来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就会从农业中释放出大量的劳动力，这些富余的劳动力如果不能被二、三产业充分吸收，就只能以隐性失业甚至显性失业的方式滞留在农村，这种局面显然不会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

“增产的农产品国内市场不能消化，难道不能通过大规模出口解决吗？”

“困难很大。乌拉圭回合和多哈谈判已经表明国际上农产品市场的相互开放步履艰难。

“再则，由于自然条件欠佳，中国农业没有比较优势，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

“我们可以用一些现实中的案例佐证上面的结论。我这里有一个上个世纪 80 年代发生在北方某地区的真实案例：80 年代初期该地区少数农民依靠种植果树苗成了万元户，当地市政府号召全市农民种植果树苗，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况且榜样就在身边。而且此时农民还没有市场经验，于是全市农民积极响应，很快这种果树苗泛滥起来，卖不出去了。为了减少农民损失，市政府又要求大家就地取材发展果园，于是果园泛滥，这种水果卖不出去，农民损失很大。大约与此同时，一些农户养殖长毛兔发家致富，最初兔毛 90 多元一斤，用于出口。市里又号召全市农民养长毛兔，于是长毛兔泛滥，兔毛价格暴跌。接着有些农户养牛发家致富，市政府又号

召全市农民养牛,为此地方政府还进行过示范推广工作,问题是养牛投资很大,农民已经吃过两次亏,不愿再上当了,大多数拒绝了这一项目,此时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无法强迫。为了完成市政府下达的养牛指标,县乡两级政府只能弄虚作假,虚报数字。当时的市长下乡视察养牛情况,为应付这一检查,县政府只得集中全县耕牛到市长要视察的那个乡,以构造出家家户户养牛的盛况,该市长先后视察了数个乡镇,这些可怜的耕牛也不得不奔波于各个乡镇之间,以至于当地传着这样一个笑话:‘咱市的牛都认识市长,因为见过好多次!’”

二、生产成本的降低能不能增加农民收入?

“既然农业总收益基本固定,增产不能增收,那么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的办法应该可以增加农民纯收入吧。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总成本的下降不就意味着纯收入的提高吗?”

“个别农户短时期内可以,但整个农业做不到这一点。注意,我们谈的是农民的共同富裕。”

“为什么不能?”

“即使技术进步等原因可以使农产品生产成本下降,完全竞争市场这个特征也意味着任何原因(包括技术进步)导致的成本下降都必然导致价格下降,这个产业不能普遍拥有超过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成本下降的好处通过市场竞争很快就会以价格下跌这个方式转移到购买者手中,农民并不能从这种成本下降中得到多大好处,也不能由此走向共同富裕。”

“我们仍然用西瓜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假设由于技术进步使得张三的西瓜的单位生产成本由原来的一元降低到五毛,如果大多数瓜农的生产成本仍然是一元,那么在同样的市场价格下,张三每斤会比别人多赚五毛,他由此发家致富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大多数瓜农学会了这一方法,那么市场上大多数西瓜的生产成本就降到了五毛,此时,竞争就会把西瓜价格压低。可以想象,如果张三仍然和你索要一元两角的价格,此时他每斤西瓜的利润是七毛而不是两毛了,这是一个很高的利润率,为了争夺这个生意,李四愿意以一元的价格卖给你,因为这样他也能够获得每斤五毛的高利润,在众多瓜农的竞争下,为了保住这个生意,张三或李四们最后只能以七毛的价格卖给你,他一斤还是只能赚两毛钱,成本下降的好处最后完全转移到了你的手中。”

“这种竞争的最终结果是那些成本偏高的农户要么退出,要么迅速学会别人



的先进技术或方法。好在农业中的新技术新方法很容易学习和传播，大规模分散作业使其也不可能形成技术垄断。这一点和其他产业有很大的不同，这也是农业不能拥有超额利润的原因之一。”

“‘公司+农户’这种经营模式可不可以改变这种局面？”

“农产品生产成本的下降由于市场竞争的原因会全部转移到购买者身上。农民并不能由此共同富裕。农产品仓储、运输、加工行业中的技术进步或其他原因导致的效率提高带来的农产品供给成本下跌，可以以利润增加的方式留在这些行业，但如果这些行业不能形成市场垄断，这些成本下跌很快会通过产品价格下降的方式转移到最终用户手中。即使这些行业可以成为垄断性行业，由此获得的超额利润也不会转移到农民身上，而是留在了这些行业。在‘公司+农户’这种经营模式下，如果农户依然是以一种分散的模式为公司提供农产品，那么各种原因带来的农产品增产、品质提高或者成本下降的好处要么仍然通过市场竞争转移到最终用户手中，要么是‘公司’利用其买方垄断地位截留在自己手中，农民得不到这些好处，而市场波动的风险公司仍然会转嫁到农户身上。说到底，作为分散的个体，农民没有讨价还价能力。可以说，‘公司+农户’这种经营模式对农民共同富裕作用有限。当然，如果‘公司’是在自愿基础上由农民组织的合作社的社办企业，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我们仍然可以用一个案例说明上述结论。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的荔枝价格特高，当时北京一斤荔枝卖到近三十元。此后，广东、广西等地区大力发展荔枝，结果是荔枝供给大规模增加，荔枝价格暴跌，北京（一个北方的高物价城市）的荔枝价格降到三元左右一斤，而广西等荔枝产地的批发价格只有五毛，果农苦不堪言。这期间还出现了一个技术进步：荔枝保鲜技术的进步使得储存和运输过程中的荔枝损耗比重大大下降，这种技术进步导致的结果可以从两个角度描述：可以说成是在既定的荔枝产量下市场上的荔枝供应量明显增加，也可以说成单位荔枝市场供给量的平均成本明显下降。当然，这两种说法实质是一回事。但不管怎样描述，最终的结果都是荔枝价格的大跌。果农并不能利用这种技术进步实现共同富裕。

“农业和其他产业还有一个显著差别。农产品生产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粮食、蔬菜作物需要数月的生长期，树木更长。这种季节性导致的第一个后果是农产品产量不能适时调整以稳定市场价格，第二个后果是生产要素一旦投入生产就成为无法回收的沉淀成本。彩电厂发现彩电滞销的同时就可以减产以适应市场需求，并同时降低生产成本。但是当果农明确预期到水果供给过剩从而会面临产品滞销

的局面时，已基本没有办法调整了。农业生产季节性一方面使得它不能通过适时减产来减少损失，另一方面也使得它不能通过适时增产抓住市场需求扩大的机会。滞后的产出调整往往还会加剧市场（价格）波动。因此和其他产业相比，农产品市场的波动性更大，更难以控制。”

“经常听人说农业要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道路，这样能不能带来农民的共同富裕？”

“和彩电、汽车这些产业不同，农业没有明显的规模经济即生产规模扩大带来单位生产成本明显下降的现象。变今天以户为独立生产经营主体的分散式农业生产方式为农场式的集约化农业生产方式，在土地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不会带来总产量的明显增加，唯一可能的结果是用机械化设施替代劳动力，从而从农业中释放出大量劳动力，问题是这些劳动力如何发家致富呢？”

“当然，从提高效率的角度讲，农业应该逐步走向集约化经营，这也是农业的必然趋势。但必须指出的是，土地经营权的（有偿）自由转让是实现有效率的土地集约化经营的前提条件。概括地讲，在土地经营权自由转让的条件下，只有那些在非农业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劳动报酬高于农业的农民才会将土地经营权转让出去，也只有那些在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劳动报酬高于其他农民、也高于自己在其他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人才会接受其他农民的土地经营权转让，这实际上意味着土地经营权将会转移到那些农业劳动生产率高的人手中，这自然实现了土地的有效率的集约化经营。

“上述这些特征意味着整个农业的净收益大致是固定的，没有太大的增长空间，农民增收只能靠减少农业从业人员来实现。道理很简单：蛋糕既然不能做大，提高每人收入的唯一办法就只能是减少分蛋糕的人数了。”

“也就是说农业是不可能让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要想让农民都富起来，有效的办法只能是大规模减少农民。同时二、三产业的发展要能够及时吸纳这些富余的农业劳动力。”

“是的，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才是大多数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真正保障。换句话说，只有让今天的农民大部分明天不再是农民时，他们明天才可能走向共同富裕。”

收入的高低取决于选择权的多少

“还有哪些因素影响农民致富？”



“经济学中一般把平均利润看做是要素报酬，那么如果我们把要素报酬算作成本，作为完全竞争的结果，农产品价格等于其生产成本，或者说，刨掉中间物耗后，农产品价格只包含要素报酬，即土地报酬、劳动力报酬和投资报酬，没有经济利润（即超额利润）。

“农民的收入就来源于农业的要素报酬，即劳动力报酬、土地报酬和投资报酬。土地报酬的获得需要事实上拥有土地所有权。

“那么要素报酬又取决于什么呢？要素报酬取决于要素用途的多少，和在每个用途上的边际生产率的高低。具体讲，土地报酬和劳动力报酬取决于土地和劳动力在非农用途上的边际生产率。如果土地和劳动力在二、三产业的边际生产率高，从而报酬高，那么农业用地和农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就高，来自于农业的报酬就必须要高，否则他们会离开农业这一低报酬行业而进入高报酬的非农行业。”

“你的意思是说，农民的收入来自于土地和劳动，而土地和劳动的收益取决于其机会成本，其机会成本又取决于其选择范围（用途）的大小，土地和劳动力的用途广泛与否取决于二、三产业的发展。二三产业发展得越快，土地和劳动力的用途就越广，农民就越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收入。”

“是的。选择权的大小取决于自由的多少。一方面，完善的、自由竞争的土地有偿转让制度，和作为其基础的、明晰的、受到法律严格保护的的土地所有权，是农民能够充分享有土地收益（特别是其增值收益）的关键所在。

“另一方面，农民劳动报酬的高低取决于其择业自由的大小，农民的择业自由越大，选择范围越多，讨价还价能力越强，农民获得的劳动报酬就越高。

“决定农民择业自由大小的第一个因素是劳动力市场的开放程度，它取决于一系列制度性因素，如户籍制度。

“决定农民择业自由大小的第二个因素是农民的个人工作能力，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受教育和培训的多少。众所周知，教育和培训可以显著提高一个人的工作能力，从而显著增加农民的职业选择机会和讨价还价能力。因此，保障农民子女包括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是长期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性前提。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过多的政府干预和管制实际上大大限制了农民的选择权（包括其对土地的经营自主权），从而减少了农民获取更高报酬的机会，是不利于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

中国人没有理由沾沾自喜

罗肇鸿*

中国人这几年可说是风光占尽,在世界政治与经济领域影响力日渐彰显。经济发展上捷报频传。经济总量超过意大利居世界第六位,外贸总额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 and 德国。中国人一改过去只谈世界经济对中国的影响的单向思维,也谈起了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在科技上,“神六”宇宙飞船遨游太空,即将实现嫦娥奔月计划。外交上也充分显示出中国外交的魅力,普遍受到赞誉。总而言之,中国就要崛起了,甚至有人认为已经崛起了,急着探讨中国崛起后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中国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不免沾沾自喜起来。

其实,这种沾沾自喜的心理是不正常的。现在没有理由沾沾自喜,将来中国强大了也不能沾沾自喜,更无必要沾沾自喜。

我不是不爱国,更不是不希望中国崛起。我只想说,背负着这种心理不利于中国崛起,影响中国人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建设一个繁荣富强、和谐温馨的中国。

愿望并不代表理性。愿望有时还会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心理负担,甚至形成一种意识形态,不容别人说半个不字。这种无形的压力是相当可怕的。无论对决策者还是普通百姓。

记得在那火热的 1958 年,我亲历的两件事至今不忘。

第一件事是我们的老师被扯到所谓“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事件上,受冤枉受煎熬,心灵创伤几十年难以平复。那时我们南开大学同全国的大学一样,全身心投入到“大炼钢铁”的运动中,物理系同学帮助我们经济系师生在校内建了一座小高炉。第一炉钢的原料是拆下学校的大铁门,炼出来的却是一大坨不知能干什么用的大疙瘩,黑乎乎地躺在地上。我们的老师对此说道,这不是得不偿失吗!老师同彭德怀扯上关系的另一件事是说“小高炉炼铁是旧生事物”。有一天正在劳动时,学校大喇叭正在广播人民日报社论,大意是说小高炉炼铁是新生事物。老师听了不以为然,说它是旧生事物,因为西汉炼铁就是用小高炉。万万没有想到,1959 年老师受到批判,罪名是“散布彭德怀右倾言论”。实际上,老师并不知道彭德怀元帅在庐山说过什么,而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老师这两句话并没有说错。

第二件事是造假还不让揭穿。1958年大跃进时,一部分南开大学师生到天津郊区参加亩产水稻万斤运动。我们的任务是把好几亩将要成熟的水稻移栽到一亩地里,安上日光灯和鼓风机,让小孩坐到稻子上面照相,宣传水稻高产放卫星的成果。参观者络绎不绝。一天,时任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的巴卢库上将来访。讲解完毕后,部长又耸肩膀又捏鼻子,根本不信。理由是把一万斤稻谷撒在地里都要覆盖一层厚厚的稻谷,怎么能长出来呢?事后,我们对这位国防部长甚为不满。我们一心想着超英赶美,拥护“大跃进”到了丧失理智的程度,我们这些造假者竟然不让别人不信假。

这种事情虽然发生在很久以前,但是,那种强烈的富强梦之下形成的民族心理并未调整过来。因为表现出来的不是理性讨论,而是背负着沉重的民族的历史包袱。这就需要我们冷静地对待目前中国在国际上的真实地位。用一颗平常心去看待别人的赞誉和诋毁,既不怕棒杀,也不被捧杀。

中国人究竟有多富?不可否认,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是,中国人还不富裕,而且收入差距很大。200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3985元,约合1700美元多一点。同中国自己纵向相比的确提高不少,但是,横向相比依然是世界上的中低收入国家,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高于0.4,而且东西部收入差距还在扩大之中。更重要的是出现了贫富的“代际转移”。《中国青年报》2006年2月12日发表的文章《贫富“代际转移”需引起警惕》指出,有关部门调查表明,不仅城市底层群体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难度加大,其子女通过教育、就业等正常渠道进入更高层次,比如公务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个底层群体既包括城市下岗职工,也包括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不仅如此,在贫穷发生代际转移的时候,富裕也在发生代际转移。有调查表明,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子女也越容易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工作收入。结果是,在穷人的孩子往往也是穷人的同时,富人的孩子更多地成为了富人。

文章得出了一个令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得不脸红的结论:贫富的代际转移造成了一个割裂的社会,富裕被垄断,贫困被“世袭”。

教育大概是可以改变人们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的有力手段。但是,就在各级政府官员都在高喊“科教兴国”的时候,却仍然把教育作为工作的软指标。在东部地区部分富人的孩子花费几万甚至几十万元来择校或者上贵族学校的时候,西部贫困地区却难得有几间不透风不漏雨的教室。

当人们把中国同印度进行对比之时,许多中国人还会沾沾自喜于我们拥有几项优势,但是,如果就教育和研究与发展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比较的话,中国显然落后于印度。设想一下,几十年之后如果印度的经济发展比中国表现得更有后劲,我们的各级决策者是否又要宣布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要让农村的几亿农民加入社会保障体系,看上病吃上药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一个德国友人这样评价中国的医疗制度:城里人死在医院,乡下人死在家里。这是目前中国农村缺失医疗保障的真实写照。

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在这个事实面前都会低下头来深入思考改变这种状况的良策,心情绝对是沉重的,而不是轻松的。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为高增长付出了多么高昂的代价。

首先,高污染、高能耗和高物耗就是高增长的代价。在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 20 个城市中,有 16 个在中国。中国超过 60% 的河流和湖泊已经被化学物质、工业废物和有毒物质污染。

世界银行称,由于农业和渔业遭受损失、工厂关门以及医疗费用增加,环境恶化和污染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每年都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8% 到 12%。

中国的环境污染已经超越国内经济问题的范畴,当局需要肩负起向国内和国际社会公开信息、说明责任的义务。

高能耗和高物耗已经引起其他国家的忧虑。这种状况也说明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正在预先吃掉子孙的饭了。

高能耗和高物耗导致出现资源瓶颈正好证明,原先的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可是有一些学界人士还在总结所谓“中国发展模式”。真叫人无地自容。

另一方面,中国目前这种增长方式还有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高投资低效率。这种由投资拉动的高增长使得增长高度依赖投资,由国内消费拉动的比例不大,由此也就放慢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把近一半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用来投资,可算是全球第一。增长是靠资金堆出来的,而不是靠提高效率得来的。它的局限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人以中国外贸总额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三而沾沾自喜。其实这个成绩也没有乍看上去那么大。因为,第一,外贸结构不合理和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低。从结构上看,出口产品的主体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企业,而是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国独资企业。它们的出口大约占外贸总额的 60% 左右。第二,中国出口的商品大多是普通百姓的日用必需品,技术含量低,可替代产品多。这种产品出口多了,不免招来竞争对手的

烦扰和挤兑,进口国如美国,得了便宜还卖乖,明明普通消费者从廉价的中国产品中得到了实惠,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率,还要告中国的状,压人民币升值。2006年1月中旬,中国媒体以醒目的标题报道:“美国消费者离不开‘中国制造’”,“没有‘中国制造’生活一团糟”。报道说,中国记者采访了一位美国主妇萨拉·邦焦尔尼,她做了一年“告别中国制造”的实验,结果证明,她家庭生活中离不开“中国制造”,因为丈夫阳奉阴违悄悄购买中国货,儿子又哭又闹要买中国玩具。我劝国人看过这些报道后千万别暗自窃喜,以为可以拿捏美国,那就上当了。你向人家提供了价廉物美的产品,人家还要告你倾销呢。再说了,那点衣服鞋袜和玩具能赚几个钱?一个芭比娃娃在美国售价20美元,中国制造商却只能拿到35美分!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是航天航空设备或者信息产品,技术含量高且无可替代,那中国在制定世界贸易规则以及产品定价权方面的发言权是什么分量?所以,在当今世界上世界经济的真正主角仍然是美国、德国和日本等等这些发达国家。

据《环球时报》2006年2月7日报道,2005年,美国对德、日的出口额达到857亿美元,相当于对中国和印度的出口额(409亿美元)的2倍多。美国企业在德国和日本的销售额相当于在中国和印度的6倍多。这组数据表明:美国、日本和德国仍然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主力。由此我赞成翟华先生(亚洲开发银行项目官员)在《环球时报》把中国制造满天飞以至于有人申请注册“非中国制造”商标的情况的原因归咎于中国是“世界加工厂”。“世界工厂”曾经让多少不谙世事的中国人着迷,想起它,民族自豪感就油然而生。但是,在当中加上一个“加”字,意义就变化了。别人出原料出图纸你来加工,你得到的就不是利润而是工资。只要中国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含量高的出口商品,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就是有限的。中国从巨额的外贸总额中得到的实际利益也是有限的。上世纪70年代日本提出“贸易立国”口号,实实在在地从外贸中获取了巨大利益。我们今天的外贸总额虽然超过现在的日本,但仔细计算起来,从外贸中得到的利益也许还不如当年的日本。中国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号称世界第三,能数得出来的国际级的产品品牌有几个?难怪德国《法兰克福报》2006年2月20日的文章会说出这样的话:“中国商人尚未在国际市场发起难以应付的竞争。”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提高缓慢,同经济快速发展极不相称。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究竟能从经济全球化得到多少利益。

国际分工从低端到高端形成一个链条,处在分工高端的国家比起低端国家来能得到较高的价值补偿,也就是取得较高的收益。因此,在国际分工中位置的高低决定